

《五体清文鉴》的语言规划取向 和对汉语北方方言研究的价值*

娜仁图雅

[提要] 《五体清文鉴》是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5种文字对照的大型词汇语义分类辞书。本文对《五体清文鉴》所反映的清朝前期语言规划取向进行讨论的同时,重点论述其汉语词条对研究北方方言的价值。

[关键词] 《五体清文鉴》 语言规划取向 汉语北方方言

一 引言

《五体清文鉴》(以下简称《文鉴》),原名《御制五体清文鉴》^①,是清朝乾隆年间编写的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5种文字对照的词汇语义分类官修辞书。竖版,每页从左至右提行,列出4个词条,每个词条从上而下共8栏,依次是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其中在藏文栏下附有两种满文注音,一种叫‘切音’(用满文字母逐个转写藏文字母),一种叫‘对音’(用满文字母为该词标音)^②。在维吾尔文栏下,附有‘对音’。”(季羨林等 1988:413)《文鉴》包括正编32卷,分36部、292类、556则,收词17062条;补编4卷,分26类、71则,收词1609条。正编及补编共收词条18671个。

《文鉴》没有殿版,只有抄本,现存三部,故宫博物院景阳宫、重华宫及英国大英博物馆各藏一部^③。

从现有对《文鉴》进行研究的文献来看,国内较早对该辞书的价值进行研究的是金炳喆(1986),他将《文鉴》的价值简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即《文鉴》提供了二百年前满、汉、蒙古、维吾尔、藏这5种语言的语音和词汇的大体状况,对于考察和认识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对应规律、同源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语言大数据挖掘与文化价值发现(14&ZH0036)”阶段性成果。

^① 1957年10月,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时,更名为《五体清文鉴》,分上、中、下三册,正文部分未作改动。本文语料依据此影印版。

^② “切音”“对音”是《文鉴》使用的两种满文注音。据季羨林等(1988:45)的介绍,清代满族语文学家达海(1594-1632),天聪六年(1632)受清太宗皇太极之命改进老满文,创造了“切音法”。该方法最初是为了拼写外来语的语音,即使用两个音节来拼写满语的外来音。这种方法后来也用于拼写满语词。李宇明(2005)认为:“如果说达海的‘切音法’还与传统语文学的反切相近,那么《五体清文鉴》的‘切音’是字母转写,与传统的反切已不一样。‘切音’的结果已经类似于拼音了。”

^③ 据影印版《五体清文鉴》(1957)所附黄明信撰写的《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包括汉文原版及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学者研究该辞书的发端。

以及构拟阿尔泰语系的始源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对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价值，即这部辞书为上述各学科提供了二百年前相关情况的丰富材料。

近年有两部《文鉴》研究专著出版。江桥（2017）通过对比“清文鉴”系列辞书，对词条收录的体系变化等作了阐述，并对《御制五体清文鉴》收录的个别名词及相关词条进行了语义解析；温都苏（2018）对《文鉴》收录的141科464属678种植物名称进行了研究，通过所收录的植物名词探索当时北方地区植物、作物的分布。

经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文鉴》的相关论著有40余种，其中，学术论文30余篇，学术专著2部，硕士学位论文9篇^①。现有研究成果都充分肯定了辞书的学术价值。但是，通过对现有《文鉴》研究论著的爬梳，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待填补的研究空白，以及有待加强的研究方向。《文鉴》作为清代多语种官修辞书的集大成者，是清朝前期语言文字政策、语言规划的外化表现。同时，清代是汉语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而清朝前期正处于满语、汉语北方方言接触的一个鼎盛时期，是汉语北方方言词汇发展或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文鉴》所收录的大量儿化词语对研究北京土话是很有价值的，而所收录词条中的“满式汉语”现象，对研究满语、汉语的接触和了解清朝前期汉语北方方言词汇的演变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文鉴》所反映的语言文字规划导向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从语言本体研究角度出发对《文鉴》所收汉语词条进行的系统整理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汉语词条对研究汉语北方方言价值的论著阙如。

本文拟对《文鉴》所反映的语言文字规划导向进行阐释，同时，在系统梳理汉语词条的基础上，探讨《文鉴》对研究汉语北方方言词汇的价值。

二 语言文字规划取向

清朝前期在大力推行满语满文和极力确立满语作为“国语”的基础上，调整语言文字规划重心，其中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对编纂汉语与民族语对照的工具书来作为贯彻语言文字政策的推手。清代是编纂官修辞书最多的朝代，不仅有《康熙字典》《御制清文鉴》，而且还有众多“译语”，《文鉴》更是“译语”之集大成者。《文鉴》的编纂，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清朝前期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文字政策导向。

（一）官修辞书从单文到多文的语言规划导向

满文从创制到改革再到推广普及，同清朝前期大力推广满语文的政策密切相关。“满语文自身的发展于乾隆朝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可谓前所未至。满文辞书、满文著述及用满文翻译的汉文典籍的涌现，是满语文大发展的直接成果和最高阶段的重要标志，如三、四、五体《清文鉴》、《清文汇书》和《清文补汇》等辞书的梓行”（杨亚庚 2005:55）。

^① 其中7篇是对《文鉴》所收录名词的专题研究：张萨础拉（2020）对《文鉴》收录的满语书面语服装名称进行了研究；包沙如拉（2019）对《文鉴》蒙古语词条中的127个无脊椎动物名词进行了考察，并参照现代动物学分类知识，对其分类阶元进行了考证；浩斯巴雅尔（2017）从动物学和动物科学史视角出发对《文鉴》“鸟雀部”中的蒙古语名词词条进行了研究；布日格德（2017）对《文鉴》“兽部”和“鳞甲部”收录的脊椎动物名词术语进行了研究；王东（2016）对满文《异域录》《文鉴》所收录名词词条进行了对比研究；阚乌云（2016）从语义角度出发对《文鉴》中的蒙古语名词词条进行了研究；吾斯曼·艾买尔（2015）对《文鉴》中的近代维吾尔语动物名词词条进行了研究。

以《御制清文鉴》为代表的“清文鉴”系列辞书众多，最初都是由满文编成，而后陆续使用当时通行的蒙古文、汉文、藏文、维吾尔文对照翻译出来，形成合璧辞书。而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没有文字的群体，则采用“译语”的方式。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举措，一方面是因为清朝建立统一、稳定的政权后国家治理的需要，特别是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语言生活变迁的需求。这样，双文、多文辞书逐渐增多。总体来看，“清文鉴”系列辞书在前人编纂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在类、目及词条收录上既有承继也有增删，并取得了一系列官修辞书成果。“清文鉴”系列代表性辞书见表1：

表1 官修“清文鉴”系列代表性辞书^①

类型	辞书名称	辞书信息		
		文种	收词	成书时间
单体	《御制清文鉴》	满	12000 余条	1708 年
双体	《满蒙文鉴》	满、蒙古	约 12110 条	1717 年
	《御制增订清文鉴》	满、汉	约 16810 条	1771 年
三体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满、蒙古、汉	约 13870 条	1779 年
多体	《御制四体清文鉴》	满、藏、蒙古、汉	约 18667 条	1791-1794 年
	《御制五体清文鉴》	满、藏、蒙古、维吾尔、汉	18671 条	约 1794 年

通过表1，可知满、藏、蒙古、维吾尔、汉5种文字合璧的《文鉴》是以前期的“清文鉴”系列辞书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具体来说，满、藏、蒙古、汉文合璧的《御制四体清文鉴》是其雏形，二者可以合称为“多体清文鉴”，这两者又是以满、汉文合璧的《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先后增编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而成。从1673年开始编纂满文“单体清文鉴”，到满、蒙古文合璧和满、汉文合璧的“双体清文鉴”，再到满、蒙古、汉文合璧的“三体清文鉴”以及满、藏、蒙古、汉文合璧的“四体清文鉴”，最终形成“五体清文鉴”，历时百余年。因此，无论是在编排体例上，还是在词条的翻译、审定上，《文鉴》都总结和承继了前期“清文鉴”辞书的经验。因此，《文鉴》可谓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作，尤其是在辞书的编纂理念上有继承，更有发展，是清朝政府语文管理和语言文字规范外化的结果。

（二）语言规划的调适和演进

《文鉴》编纂于乾隆中后期，当时的语言生活状况和满语文的生态环境都在发展和变化。清军入关至康熙后期是满语文兴盛时期，满族的语言生活是“满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满汉合璧”局面；到乾隆中期，则已变为“汉语为主、满语为辅”的“满兼汉”情形；至乾隆后期满语文已出现衰颓之势。乾隆皇帝注意到了这种严峻情势，因此屡颁圣谕，通过官方引导及规划来发展满语文。白新良（2001:59）提到，“乾隆四年四月，他下令扩大清语使用范围，‘各部院文移清汉兼写，以免清文荒废’。”据杨亚庚（2005:15）的研究，《高宗实录》中，乾隆元年（1736）四月至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期间大约有46条与语言文字相关的资料记录留存下来，如“奏，八旗满洲等考试翻译满文，定例三年考取生员二次，举人一次，进士一次……”。可见当时对语言文字特别是满语文的发展是尤为重视的，并制定了具体标准及

^① 表1主要根据《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一文中“一体至五体清文鉴内容比较表”整理。

措施。《文鉴》正是在这样一种语言生态下组织官修的，是语言规划调适的产物。

从《御制清文鉴》的满文单体发展到《文鉴》的多文并存，这一辞书编纂理念的变化，侧面反映了清朝前期语言规划重心的大体移动轨向，即：满语文单体→满蒙/满汉合璧→满兼汉→多语文并存。《文鉴》作为当时收录文种最多的官修语文辞书，处于轨向末端，是官方阶段性地调适语言文字规划重心的举措和印证。

（三）多语种多文种并存并用的语言政策导向

清朝前期大力推广满语文，但要实现“同文”“同语”却非易事。特别是到了乾隆中后期，语言生态环境复杂：一是全国各地区处于语言文字不统一的复杂状态；二是同汉语相比，满语是弱势语言，虽为“国语”，但其发展颓势已现；三是尽管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得到强化，但是多民族、多语种的语言国情给语言生态环境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清政府需要在语言政策上对这种多样性状况作出战略性反应。“多语并存并用”既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也是合乎时宜的一种语言文字规划导向。

“多语多文并存并用”本身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文鉴》收录多语种多文种这一事实来看，面对复杂的语言国情，清朝政府在语言规划向上所做出的选择是：致力于发展和规范满语文的同时，兼顾对蒙古、汉、藏、维吾尔4种语言文字的规范与传播。这一选择反映了当时对于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要求和多民族语文并存并用的政策导向。

从工具书本身的属性来说，也是多语种多文种并存并用导向的一个佐证。《文鉴》不仅是其他民族学习满语文的工具书，同时也是满族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工具书。满足各语种文种的教学与学习需求是《文鉴》编纂的目的之一。

从人才培养来看，清代官学教育注重对翻译人才或多语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八旗官学”“回子学”都是专门培养多语人才的官办教学机构。而且，翻译科举从雍正元年（1723）设立，发展至乾隆时期规制已越来越完备。也就是说，随着翻译人才或多语人才培养与选拔在清代官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当时的教育政策导向及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和目标，都涉及到工具书的问题。而官修“清文鉴”系列辞书是当时之需，包括《文鉴》在内，其组织编修也是解决语言教学及学习需求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多语多文并存并用政策导向的体现。

从《文鉴》收录的词条来看，实用性和百科性的特点尤为突出。由于“官修的辞书大都是为适应民族间相互交流、翻译工作需要产生的，因此大多是双语和多语对照词典。”（戴庆厦、王远新 1985）因此，《文鉴》的编撰目的不仅仅是为减少各民族、各地区相互交流的语言障碍提供工具书，客观上也对因语言交际障碍而可能引发的语言冲突起到预防作用，为保证政令畅通和发展民族关系奠定基础。应该说，《文鉴》的编纂具有发展各民族语言的自觉意识，也侧面反映了清朝前期多语多文并存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导向。

（四）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导向

《文鉴》是多文种辞书的集大成者，是清朝前期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重要成果，同其他官修典籍一样，它的编纂同样体现了清代“昭同文之治”的语言文字规划思想，不仅是要汇释语言文字以便于各民族间的交流，还自觉肩负着规范和发展满语文及其他语言文字的责任。因此，在收词、审音、定形、释义等方面会更自觉、更规范。

官修辞书通常有专门的机构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编纂。从编纂机构来看，《文鉴》出自“清字经馆”（春花 2014）。该馆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立，为翻译经典的机构；嘉庆四年（1799）改为“实录馆”。

从《文鉴》编纂者资历来看,翻译人员具有官方认可的资质,如维吾尔语的23名翻译人员中,有18名后期加入的“回子学”毕业生和编纂初期官方指派的5名翻译人员。

综上,从组织编纂的机构和编纂人员情况来看,《文鉴》的纂修不是随意之举,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是清朝政府推行、贯彻语言政策和传播语言文字的重要举措。因此,官修辞书是清朝政府规范语言文字的重要途径之一,代表了当时语言文字规划的导向。

(五) 构建“民族共同语”的战略导向

在清朝前期多元族群及复杂的语言生态环境下,推行清朝“国语”具有重大意义。乾隆中后期满语文颓势已现,实行“多语多文并存并用”的语言政策已势在必行。但是,“多语多文并存并用”的语言规划导向与推行“国语”、构建“民族共同语”并不矛盾。从《文鉴》对文种的选定和调适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文鉴》在《御制四体清文鉴》的基础上增加了维吾尔文,这与清朝政府对新疆的进一步治理有关。从当时新疆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情况来看,维吾尔族人口占比高、分布广,维吾尔语使用人口众多。面对民族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新疆多样化语言生活状况,无论是出于政令畅达的现实需求,还是推行满语作为“国语”的需要,都有必要将维吾尔语文纳入辞书。

《文鉴》收录了5种文字记录的常用词汇,一方面是通过文字汇释,供臣工与百姓学习“国语”满语,以减少语言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旨在普及和提高边疆地区规范使用满语文的水平,以倡导文化上的“向心性”,为“共同语”的形成和政治统治的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因此,我们认为《文鉴》的编纂是构建“共同语”战略导向的体现,对清朝的语言文字规范及其发展具有促进意义,对多民族国家“共同语”的形成有一定的贡献。

三 对汉语北方方言研究的价值

《文鉴》是一部多文种对照的语义分类词汇集,共收录了18671个汉语词条,其中明确标注释义的约计18145个,另有526个表示为:“汉语同上”“汉名同上”“汉语亦同上”“汉语同上连用”。从词条的收录情况来看,既包含基本词汇,如“天、日、月”等;也包含一般词汇,如“木瓜、高粱、柿子壶”等;同时还收录了一些方言词、借词等。词条的编排主要是围绕核心词目扩展。本文以“天部·天文类(第一~第四)”为例,参见表2。

表2 《文鉴》词条收录示例

部	类	核心词目	扩展词条
天	天文	天	上天、苍天、天气清肃、东方明、黑朦胧、黎明、天亮
		日	日光、日照、日光转射、晒、日暖、日出、日微斜、影
		月	明月、月朗、月牙、上弦、下弦、月圆、月色淡、月食
		星	北辰、天极星、帝星、七星、北斗、木星、火星、土星
		云	生云、云布满、天带微云、霞、彩云、浮云、火烧云
		雾	下雾、雾高起、雾沉、下浓雾、雾收、濛气凝聚
		雷	雷鸣、轰雷、雷声不断、焦雷、雷击
		电	打闪、电光闪烁、电光微闪、电光接连、露水闪

从表 2 可见,《文鉴》收录的词条主要以“部、类、核心词目、扩展词条”的顺序编排,每一核心词目下所收词条不等,核心词目下的扩展词条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文鉴》收录的汉语词条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也有多音节的(最长的词条有 11 个音节)。各种音节词条的数据统计参见表 3。

表 3 不同音节词条示例与数量统计

词条音节类型	词条示例	数量	占比
单音节	天、云	2060	11.04%
双音节	月琴、河港	8339	44.66%
三音节	吉祥草、磨刀石	5107	27.35%
四音节	齐梅针箭、两河中间	2298	12.31%
多音节	不住的搦翅、发水后树木上挂的柴草	867	4.64%

从表 3 可见,《文鉴》收录的汉语词条以双音节为主,占 44.66%。需要注意的是,三音节及以上的词条占比达 44.3%,几乎与双音节词条的占比持平,这与《文鉴》中大量存在“满式汉语”有关。

《文鉴》收录了大量带有明显口语化特点和地域特色的汉语北方方言词汇,如“打裕襟、生耳底、蝌蚪姑”等,这些词汇展现了清朝前期北方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情况和风土人情,对研究汉语北方方言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为清朝前期的北京话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语料。

(一) 对研究清朝前期汉语北方方言词汇系统具有语料价值

《文鉴》所收词条具有生活化特征,记录和反映了清朝前期北方地区从日常饮食到农业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词汇,反映了地域文化特色和风土人情。

1. 日常饮食相关词条

《文鉴》中有大量与日常饮食相关的词条,从果品、菜品到肉品等,收录全面,尤其是北方地区特色食物名称多有收录。相反,对于长江以南地区的特色饮食词条收录的却比较少。因此,《文鉴》凸显了以北方地区为主要地域的词条收录理念。

以下分类列举《文鉴》中一些与日常饮食相关的词条:

①菜肴类

黄花菜、木耳、沙葱、海带菜、马齿菜、曲麻菜、酱瓜、野鸡膀子菜

②果品类

苹果、梨、柿子、杏、杨梅、沙果、红姑娘、槟子、酸枣、橘子、高丽香瓜、波斯枣

③饽饽类

月饼、豆面子饽饽、麻花、重阳糕、馄饨、饺子、甑儿糕、豌豆黄、八宝糖

通过上述词条我们能够看到,《文鉴》中饮食类词汇较为丰富,其中不乏典型的北方饮食词汇。比如,“菜肴类”中的“沙葱”,便是西北及内蒙古地区特有的野菜;“木耳、黄花菜、曲麻菜、红姑娘”则多产自东北地区,特别是“曲麻菜”,是典型的东北方言词。“果品类”词汇有 80 多个,尽收南北,同时也有来自域外的瓜果,其中,“沙果、红姑娘、槟子”是东北地区出产的水果,名称至今仍在用;“波斯枣、高丽香瓜”等则来自域外。“饽饽类”中收录的词汇颇具民族特色,如“豆面子饽饽”是满族的特色食品。此外,像“甑儿糕、豌豆

黄、八宝糖”则是北京的特色小吃。总体来看,《文鉴》较少收录稻米制的食品,只有“干饭、稀饭”等少量词语。从中国“南米北面”的饮食习惯来看,侧面反映了日常饮食相关类词条是以北方地区的饮食词汇为主要收录对象的。

2. 农业生产相关词条

《文鉴》中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词条很丰富,这些词条大体关涉农作物、农耕用具、劳作方式、春耕及秋收等农事活动。例如:

①农工类

萌芽、开花、结子、作粒、耘草、分苗、培苗、挑旗、二茬苗、打场、谷楂子、半收

②农器类

犁杖、锄头、犁铧、荡头、耙、爬子、水磨、碾子、簸箕、筛罗、轱辘、水车、桦皮篓

③米谷类

小米、小黄米、凉谷米、糜子、黍子、高粱、黏高粱、笤帚高粱、麦子、青稞、荞麦

④草类

灵芝、瑞草、吉祥草、七里香、安春香、乌拉草、羊草、引火草、半夏、人参、益母草

上述词条中,“农工类”收录的主要是与粮食作物、耕作方式等相关的词条,其中“挑旗”主要是指麦子,当小麦旗叶完全展开时称为“挑旗”;“农器类”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农业器具,其中“轱辘”是北方地区取水设施的名称。《文鉴》中也收录了一些满族常用的农耕用具,如“桦皮篓”,该词同时也是满族特有的与“桦皮篓”相关的游戏形式的名称。“米谷类”的“小米、小黄米、高粱、麦子、荞麦”等主要也是北方出产的粮食作物;“草类”中的“乌拉草”就是生长在东北地区的代表性草种。药草也有记录,如“人参、灵芝、半夏、益母草”等在长白山地区较为常见,尤其是“人参”,为“东北三宝”之一。

此外,如“羊草、引火草”,是根据草的主要用途而命名的,这两个词在今吉林省的乡村地区仍在用。“草类”词语的收录与草是当时重要的生活资料有关,同时也与满族先民在白山黑水之间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特别是有些草类词汇还承载了民族文化的认知与印记。满族人视草为吉祥之物,因此有“瑞草、吉祥草”等词汇。据王钊(2017)考证,“七里香”即生长在长白山地区的宽叶杜香,“安春香”则为兴安杜鹃,二者都是当时满洲人萨满祭祀的香料。由于这两种草与满族的祭祀文化相关,自然也被收录了进来。因此,农业生产相关词汇侧面反映了清朝前期北方地区的农耕文化与生产生活。

综上,我们认为,《文鉴》大量收录的是北方官话区的汉语词汇,如有些是北京话词语,有些则是东北话词语。这些词条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清朝前期北方地区饮食及农业生产生活的情况。这些词汇不仅深具地域特色,同时文化内涵丰富。而且,《文鉴》中还有大量口语化的汉语词条,是珍贵的清朝前期北方汉语方言口语语料,是研究北方汉语方言的宝贵资料。

(二) 对研究清朝前期汉语北方方言语言接触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清朝前期虽然以满语为“国语”并加以推行,但是满语在通用力、传承力上都比较有限,同汉语相比,满语无论在使用人口还是文献积淀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强势、弱势语言的出现,在语言接触中会导致弱势语言群体习得强势语言,从而形成双语或多语现象。陈保亚(2005)认为:“语言接触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强势语言向弱势语言输入词汇。除了地名、人名、特殊名物以外,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输入词汇的情况很少。……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的影响,或者说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是有系统和规则的,这种影响的机制除了特殊词汇借贷,更

主要的是母语干扰和母语转换。”就满、汉语言接触而言，满语作为弱势语言势必会大量吸收汉语词汇，同时也会有满语词汇进入到汉语的词汇系统中，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词汇系统的增容”；满语对汉语的影响，还体现在满语母语人在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过程中，母语所产生的干扰作用，即“满式汉语”现象。《文鉴》中反映满、汉语言接触的语言现象较多，为我们研究清朝前期汉语北方方言语言接触状况提供了语言材料“样本”。

1. “满、汉词汇增容”现象

满语、汉语接触过程中，词汇借债而引起的词汇增容现象比较突出。通常情况下，形象化的词语易于识记、可接受度高，具有这样特点的词语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容易进入和充实到彼此的词汇系统中来。例如：

①彩色类

桃红、银红、水绿、沙绿、松绿、月白、姜黄、藕荷色、秋香色、青莲紫、鹦哥绿、苹果绿、瓜皮绿、鱼红、火焰红、玫瑰紫、雁绒色、茄花色、柿黄、葵黄、黄香色

②弓箭类

牛蹄弓、鱼鳃弓、长角弓、花水牛角面弓、野牛角面弓、野羊角面弓、梅针箭、齐梅针箭、月牙披箭、燕尾披箭、圆哨箭、方哨箭、榛子哨箭、墩子箭、鸭嘴荷包哨箭

“彩色类”词语中大约有 70 个左右的颜色名称。有些是传统的汉语颜色词，如“桃红、松绿、月白、姜黄、藕荷色、秋香色、青莲紫”等；有些则可能是根据满语的色彩词义翻译为汉语的颜色词，如“鹦哥绿、苹果绿、瓜皮绿、鱼红、火焰红、雁绒色、茄花色”等。满语颜色词往往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或植物的色彩，视觉形象突出；有些词汇属于创新性使用色彩名称，如“葡萄色焦饼”等。上述一些满语颜色词渐渐稳固下来，并通过意译方式进入到汉语词汇系统，如“沙绿、玫瑰紫、柿黄、葵黄、黄香色”等，这些颜色词至今仍在使用，是对汉语传统色彩名称词的有机补充。

“弓箭类”词语大多直观反映了弓箭的形状或材质，形象化特征尤为明显。其中，与“弓”相关的名词大约收录了 20 个，与“箭”相关的名词大约收录了 60 个。从《皇朝礼器图式》记载来看，军用箭有 6 大种类，如“梅针箭、月牙披箭”等，这些弓箭名称在《文鉴》中基本都有收录。收录之全面与满族重骑射、好武功的传统相关，且清军入关前，弓箭是常用军事武器之一，并在军中设有弓箭兵编制。汉语“弓箭类”词条基本是据满文词汇翻译而来的。

此外，《文鉴》还收录了大量的日常用品及用具名称词条，散见于多个类。例如，“千金、水平、风箱、熨斗、蜈蚣梯、雨点钉、马牙蹉”，见于“工匠器用类”；“黄九龙伞、孔雀扇、仙鹤旗”，见于“卤簿器用类”；“如意挂钩”，见于“间隔类”；“火锅、果叉、马勺、腰子壶”，见于“器用类”；“虎帽”，见于“军器类”；“搭连布”，见于“布帛类”；“八仙桌”，见于“器用类”；“溜冰鞋”，见于“靴鞋类”。上述词条有双音节的，有三音节的，也有四音节的，其中三音节的词汇形象性较为突出，如“蜈蚣梯、雨点钉、孔雀扇”等。这些词对了解清朝前期汉语北方方言的词汇系统有重要价值。

综上，可以看出，《文鉴》所收录的颜色词和生活器物类词语，是经过语言接触，通过词汇借债实现增容后的词条汇总。比如色彩词汇，就是在收录汉语传统颜色词的基础上，吸收了满语颜色词，丰富了色谱的同时也扩大了汉语颜色词的规模。

2. “满式汉语”现象

“满式汉语”是满、汉语接触过程中，满语母语人由于母语负迁移导致的语言干扰现象。

本文中“满式汉语”主要指保留明显满语特征的汉语词汇。《文鉴》收录的此类词条大体能够根据字面意思理解其义，如“雨透、旁风、冰酥、山腿、将才（刚刚）、使办理、荒烧地、下米心雪、唇下洼处”等。有些“满式汉语”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参见表4。

表4 “满式汉语”词条示例

汉语词条	满语带 -gga 后缀的词条	汉语词条	满语带 -gge 后缀的词条
有识见	gūningga	有心的	mujilengge
有识见的	gūnihangga	有造化的	kesingge
有志的	mujingga	有福祉的	fengšengge
有度量	fūniyangga		
有度量的	fūniyangangga		
有福的	hūturingga		
有寿的	jalafungga		

从表4可见，上述汉语词条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形成了“有N的”形式的词条。满语的 -gga、-gge 通常用作后缀，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含义。《文鉴》收录的这类词条，主要用来表示对人的脾气、秉性、做事方式等的评价。也就是说，满、汉语言接触过程中，满语 -gga、-gge 后缀的语法特征被保留了下来，形成了汉语“有……的”形式的词条，所反映出的是语言接触过程中满语的语法特征对汉语的渗入和干扰。

除了上述这种典型的“满式汉语”现象之外，还存在不少意义不甚明确的词条，如“小心人、云搭花、干湿花搭处”等。民族语的干扰深度和干扰方式必然会增加一些汉语原本不存在的词汇构造，进而影响到汉语北方方言新词汇的形成和发展。《文鉴》中的“满式汉语”词条对我们研究汉语北方方言的语言接触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东北旗人话和汉语北方方言（如老北京话）的融合状况，汉语北方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中包含了哪些满语成分，等等。

综上所述，在清朝前期的满、汉语言接触中，形象化词语的借用是实现词汇增容的一个有效途径，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存在双向输入，经词汇借贷而实现词汇增容。同时，“满式汉语”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对北方汉语方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为我们了解清朝前期汉语北方方言词汇的发展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对于研究北京话及东北话具有重要价值

《文鉴》收录的汉语词条中，有不少“儿”化及“-子”缀现象，这些词语充满了口语化的气息，带有明显的北京话（土话）、东北话的特征。

1. 带“儿”化现象的词语

“儿”化是北京话突出的方言特征之一。“儿”化不只是语音现象，还是词汇现象、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文鉴》收录了120多个带有“儿”字的词条，其中约有60个是“儿”化词语。此类词语中，单音节的有17个，双音节的有30个左右；其余为三音节及多音节的，但数量相对较少。例如：

① “儿”化单音节词

花儿、针儿、灰儿、套儿、皂儿、豚儿、牛儿、鹤儿、刻儿、毬儿、背儿、稍儿

② “儿”化双音节词

油罐儿、火星儿、树猫儿、一顺儿、蛐蛐儿、秋凉儿、扯锯儿、踢毽儿、狗刨儿

③ “儿”化三音节或多音节词

有嚼头儿、鸦鹊垛儿、跑钩漂儿、叫人吊味儿、豌豆叶儿菜

④特殊的“儿”化词

刺儿菜、瓢儿秃、甑儿糕、珠儿线、庙儿灯、子儿皮、花儿穷、花儿稀、花儿密

“儿”化词语的类型，以名词“儿”化居多，如单音节的“花儿、针儿、牛儿”，双音节的“火星儿、蛐蛐儿、秋凉儿”等。除名词外，还有动宾词组的“儿”化，如双音节的“扯锯儿、踢毽儿”；副词的“儿”化，如“一顺儿”等。这几种类型的“儿”化词语不仅成规模，且有规律可循，“儿”都处在词尾位置，具有情感色彩和口语化特点。

此外，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儿”化现象。如“刺儿菜、瓢儿秃、甑儿糕、珠儿线”，是将某个双音节名词拆分开，使“儿”处于词中间位置。还有的词条是由“儿”化词语构成的主谓结构，如脓疮类有核心词条“花儿”，义指“天花”，其扩展词条有“花儿穷、花儿稀、花儿密”等，主要是用来表示出天花时的数量、密度、状态等。“花儿”本身就是一个单音节的“儿”化词语，其形式在扩展词条中没有变化，且这组词条与原满文词条的语音无关。这种“儿”化现象，很可能是为了忠实于满语词条原义而直译的结果。这些“儿”化现象至少可以说明“儿”化词语在清朝前期已经较为稳固了。《文鉴》收录的“儿”化词条对研究北京话“儿”化韵及北方汉语其他方言“儿”化韵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时间断代参考。

2. “-子”缀及特征词缀

“-子”缀是汉语北方方言口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文鉴》中由“-子”后缀构成的词条有400多个。其中，双音节的词汇大概占比50%左右，如“租子、胰子、把子、法子、厨子、戏子、癞子”等；三音节的词汇约占30%，如“杨辣子、蝎虎子、撂脸子”等；多音节的也有所收录，如“松油亮子、大黄蚊子”等。

此外，还收录了一些特征词缀，如后缀“-拉”“-溜”“-的慌/荒”“-极了”。虽然收录的词条数量较少，但具有明显的汉语北方方言的口语化特征。

“-子”缀及特征词缀示例、收录数量、收录密度等参见表5。

表5 “-子”缀及特征词缀示例、收录数量、收录密度

词缀	词条示例	数量	密度
-子	胰子、糰子、崽子、笼子、戏子、冠子、渣子； 杨辣子、蝎虎子、桌牙子、撂脸子、柜隔子； 木头梢子、松油亮子、大黄蚊子、油麦面饼子	400余	大
-拉	皮拉、扑拉、搭拉、涩拉、滴溜搭拉	5	小
-溜	直溜、出溜、地出溜、滑溜、急溜、紧溜	6	
-的慌/荒	恶心的慌、馋的慌、扎的荒	3	
-极了	好极了、饿极了、气极了、热极了、乏渴极了	5	

从表5可见，“-子”缀词条在《文鉴》中的收录密度较大，充分反映了清朝前期“-子”缀的使用具有普遍性。此外，几例特征词缀，从结构上来看具有规律性，但收录的词条数量

较少。推测在该时期北方地区的语言生活中这些特征词缀可能正在形成的初期，如“-的慌”和“-的荒”形式，虽然表达的意义相同，但二者在字形上还没有统一。

综上，从整体来看，《文鉴》收录的汉语词条中，“儿”化现象及“-子”等后缀构成的词条收录密度较大，推测在清朝前期使用已比较广泛；形式较稳定且具有能产性，情感色彩浓厚，带有北京话的显著特征。其中有很多是北京话的土话，如“狗刨儿、扎猛子、杨辣子、蝎虎子、桌牙子、撻脸子”等。这些词条对研究北京话的形成、北京话语法的演变、北京话的土话或口语特征词、北京话与东北话之间的关系等皆具有重要价值。

四 结 语

《文鉴》收录的词条包罗万象，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多文种对照词汇分类工具书，不仅是一部官修多文种辞书文献，还是一部学科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当前，对《文鉴》及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挖掘和利用整体上还比较匮乏，本文只就其语言规划导向及对汉语北方方言研究的价值展开了初步探讨，对其文化价值、史料价值等尚未触及，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多角度展开相关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 白新良. 2001. 《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南开学报》第4期.
- [2] 包沙如拉. 2019. 《〈五体清文鉴〉中的无脊椎动物名词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 布日格德. 2017. 《〈五体清文鉴〉兽部和鳞甲部中记载的脊椎动物名词术语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 陈保亚. 2005. 《语言接触导致汉语方言分化的两种模式》，《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
- [5] 春花. 2014. 《〈御制五体清文鉴〉编者及编纂年代考》，《满语研究》第1期.
- [6] 戴庆厦、王远新. 1985. 《试论我国少数民族辞书的发展》，《民族研究》第4期.
- [7] 浩斯巴雅尔. 2017. 《〈五体清文鉴〉鸟雀部中的名词术语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8] 呼和. 2013. 《清朝民族政策对“清文鉴”系列辞书编纂的影响》，《学理论》第32期.
- [9] 季羨林、周祖谟、许国璋等. 1988.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0] 江桥. 2017. 《〈御制五体清文鉴〉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11] 金炳喆. 1986. 《〈五体清文鉴〉和它的价值》，《辞书研究》第5期.
- [12] 阚乌云. 2016. 《〈御制五体清文鉴〉的蒙古语名词词义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3] 李宇明. 2005. 《切音字的内涵与外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14] 吾斯曼·艾买尔. 2015. 《〈五体清文鉴〉中的近代维吾尔语动物名称研究》，伊犁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15] 王东. 2016. 《满文〈异域录〉与〈御制五体清文鉴〉名词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6] 王钊. 2017. 《众神之飨——以〈嘉产荐馨〉为中心探究清代满族萨满祭祀用香》，《满族研究》第4期.
- [17] 温都苏. 2018. 《〈五体清文鉴〉植物考》，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8] 杨亚庚. 2005. 《〈清实录〉所见清前期语言文字政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9] 佚名. 1957. 《五体清文鉴》（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 允禄等. 2004. 《皇朝礼器图式》，牧东点校，扬州：广陵书社.
- [21] 张萨础拉. 2020. 《〈御制五体清文鉴〉满语书面语服装名称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Language Planning Orientations of *Wuti Qingwenjian* 五体清文鉴 and Its Value for th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Naren Tuya

[Abstract] *Wuti Qingwenjian* 五体清文鉴 is a government-ordained large-scale semantic dictionary compiled in five writing systems, Manchu-Tibetan-Mongolian-Uyghur-Chines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anguage planning orientations during early Qing dynasty, as reflected from *Wuti Qingwenjian*, and expounds on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entries for the research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Wuti Qingwenjian* 五体清文鉴 language planning orientations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通信地址: 100089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

“第五届边疆语言文化暨第七届中国周边语言文化论坛” 在呼伦贝尔学院召开

由北京语言大学、内蒙古大学、呼伦贝尔学院联合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周边语言文化研究所/中国民族语文应用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呼伦贝尔学院学科建设办公室和科学技术处承办,《百色学院学报》编辑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协办的“第五届边疆语言文化暨第七届中国周边语言文化论坛”于2021年7月9-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学院召开。来自北京、新疆、广西、云南、四川、福建、辽宁、河南、安徽、吉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8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74篇,内容涉及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与实践、跨境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及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描写、比较、语言接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言资源与语言生态等方面。会议决定“第六届边疆语言文化暨第八届中国周边语言文化论坛”将于2022年在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举办。

(普驰达岭)